

农村正规金融发展与经济二元转型： 促进抑或抑制？

许月丽^{1,2}, 张忠根¹

(1. 浙江大学 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29;

2. 浙江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 不同于以往研究主要以信息经济学为理论基础, 文章从一个新的视角——经济二元转型, 对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的经济绩效重新进行了审视。以费—拉的二元转型增长模型为基础, 文章首先构建了以工农两部门金融市场为纽带的城乡经济互动的一般均衡模型, 并在这一理论架构下对农村金融与经济二元转型的关系进行了规范分析, 进而提出了一个假说。在此基础上, 文章利用既考虑理论又考虑变量长期互动关系的SVAR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了验证。实证结果表明, 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 以市场自然演进机制为基础的工农部门间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促进二元转型增长。

关键词: 二元转型; 农村金融发展; 区间效应

中图分类号: F061.3; F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952(2013)04-0004-12

一、引言

从一个二元转型框架较系统地观察农村金融发展的动态演进问题始于 Fei 和 Ranis(1997), 而此后却鲜见此方面的研究。Fei 和 Ranis(下称费—拉)的研究逻辑是, 将经济从生产与组织形式上分为城乡两个部门, 城市从事商业化的工业生产, 农村则从事传统的生产与消费合一的农业生产, 农村部门用多余的农产品交换城市部门的工业品, 并将所得资金盈余通过城乡间的部门金融市场转移给城市, 形成城市部门投资的一部分, 促进工业扩张。工业扩张使其有能力从农村吸收更多的劳动力, 进而引起城乡贸易条件逐渐向有利于农村的方向转变。这意味着农村部门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可以拥有更多的从城市部门获得的资本投入, 由此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容易看出, 在这一框架中, 经济转型与金融发展之间隐含着部门间金融市场——城乡贸易条件——农业资本品投入这样一个作用机制链条。也就是说, 尽管在转型过程中, 农村首先起到的是向城市提供储蓄

收稿日期: 2012-12-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BJY099);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Y6110248)

作者简介: 许月丽(1972—), 女, 浙江诸暨人, 浙江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生,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张忠根(1962—), 男, 浙江上虞人, 浙江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的功能,但这一过程也促进了城乡间要素禀赋的变化,进而引起城乡贸易条件向有利于农村的方向转化,最终通过农业资本品投入的增加而提高了农业生产率。这说明,二元转型过程中部门间金融市场的发展并不单纯意味着农村部门的“失血”,从动态的角度看,金融发展与农业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农业的特殊性与农村金融市场的复杂性,中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得到了广泛的关注,相关研究已积累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要么仅进行单向因果关系的简单回归分析,要么仅是基于对农村的一种人文关怀,这种研究范式显然缺乏理论基础且研究通常仅是短期的。据此,本文是在一个二元转型框架内将农村资金外流看作是工农部门间金融市场的一种互动,在建立一个二元转型的规范分析体系基础上,利用既考虑理论又考虑变量长期动态互动特征的结构 SVAR 模型,对农村资金外流的长期动态转型效应进行了系统分析。

二、农村金融发展与二元转型：分析框架与假说

1.经济环境。假设:(1)经济满足克洛尔(Clower)约束,即交易必须通过货币来完成,而不是一般的信用或物物交换。(2)经济只包括工业与农业两个部门,且农业由生产与分配合一的同质家庭部门组成,因而农村金融市场即部门间金融市场。(3)工业部门利用资本和劳动力生产工业品,其中新增劳动力来自农业部门,资本的形成来自工人的储蓄(通过工业内部金融市场)与农民的储蓄(通过部门间金融市场)。(4)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农业产出取决于资本投入与技术水平。(5)除部门间金融市场外,部门间还存在另外两个市场:包括工业品与农产品两个子市场的部门间产品市场,以及部门间劳动力市场。通过农产品市场,工人获得生活所需的农产品,农民则获得货币收入;通过工业品市场,农民利用获得的部分货币收入购买工业品,这些工业品形成了农业生产的资本。农民的剩余货币收入则以储蓄的形式通过部门间金融市场成为了工业部门投资的一部分。(6)工业部门的要素比率不变,因而投资的增加引致了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增加的劳动力需求通过城乡劳动力市场来获得满足。(7)类似于费一拉(1997),与工业部门的生产与消费相分离不同,农业部门的家庭既是消费主体也是生产主体。(8)农业部门家庭是同质的,因而农业内部不存在借贷关系。(9)利率外生,因而农村金融发展仅指的是工农部门间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大(下同),并且均衡时工业部门的储蓄与投资相等。不考虑折旧、技术变迁、市场摩擦与经济中的不确定性。

2.模型。(1)农业产出与货币收入。假设农业产出仅取决于农业资本的投入,不存在折旧,则有:

$$Q_{At} = A F(K_{At}) \quad (1)$$

$$K_{At} = K_{t-1} + I_{1t} \quad (2)$$

$$\partial Q_{At} / \partial K_{At} > 0 \quad (3)$$

$$Y_A = P_{At} Q_{IAt} + \beta r P_{At} Q_{IAt} = (1 + \beta r) P_{At} Q_{IAt} \quad (4)$$

其中, Q_{At} 为农业产出, A 为农业技术水平, K_{At} 为农业部门的资本投入, I_{It} 为农业部门的投资, β 为农业部门从部门产品交换中获得的货币收入用于储蓄的比例, r 为工业部门支付的利率, P_{At} 为农产品价格, Q_{IAt} 为与工业部门交换的农产品数量。式(3)表示农业产出随资本投入的增加而增加, 式(4)表示农业的货币收入来自两部分: 一是工业部门对农产品的购买; 二是从工业部门获得的利息收入。

(2) 部门间产品市场均衡。

$$P_{It} I_{It} = (1 - \lambda) Y_A = (1 - \lambda) (1 + \beta r) P_{At} Q_{IAt} \quad (5)$$

$$Q_{IAt} = Q_{IAt}(L_{It}) \quad (6)$$

$$L_{It} = L_{It}(K_{It}) \quad (7)$$

$$\partial Q_{IAt} / \partial L_{It} > 0, \partial L_{It} / \partial K_{It} > 0 \quad (8)$$

其中, P_{It} 为工业品价格, λ 为农业部门总储蓄比例, L_{It} 为工业部门劳动力投入, K_{It} 为工业部门资本存量。式(5)表示除了储蓄以外, 农业部门的收入被用来从工业部门购买农业资本品。式(6)、式(7)和式(8)的含义是工业部门用工量的增加与其资本存量正相关, 同时引起了工业部门农产品购买的增加。

(3) 部门间金融市场均衡。

$$\dot{K}_{It} = S_{At} + S_{It} \quad (9)$$

$$S_{At} = \lambda Y_A \quad (S_{At} \text{ 为农业部门的储蓄, } S_{It} \text{ 为工业部门的储蓄}) \quad (10)$$

3. 农村金融发展影响二元转型的机制。二元转型的含义是, 经济由在生产、组织与分配等方面具有传统非商业化特征的农业部门向现代高度商业化的工业部门转变。(1)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产出。式(1)、式(2)、式(5)、式(6)、式(7)、式(9)、式(10)联立可得如下非解析解:

$$\begin{cases} \dot{K}_{It} = \dot{K}_{It}(S_{It}, S_{At}) \\ L_{It} = L_{It}(\dot{K}_{It}) \\ Q_{IAt} = Q_{IAt}(L_{It}) \\ I_{It} = I_{It}(Q_{IAt}, r, P_{At}/P_{It}) \\ S_{At} = S_{At}(P_{At}, r, Q_{IAt}) \\ Q_{At} = Q_{At}(I_{It}, K_{It-1}) \end{cases} \quad (11)$$

显然, 如果利率、价格、前定变量和工业部门储蓄都是外生的, 那么由具有递归特征的联立方程式(11)可以得到如下均衡解:

$$Q_{IAt}^* = Q_{IAt}^* \{L_{It}[\dot{K}_{It}(S_{It}, S_{At})]\} = Q_{IAt}^*(S_{It}, P_{At}, r) \quad (12)$$

$$S_{At}^* = S_{At}^*(P_{At}, r, Q_{IAt}^*) = S_{At}^*(P_{At}, r, S_{It}) \quad (13)$$

$$\begin{aligned} Q_{At}^* &= Q_{At}^*[K_{It-1}, I_{It}(Q_{IAt}^*, r, P_{At}/P_{It})] \\ &= Q_{At}^*[K_{It-1}, I_{It}(S_{It}, P_A, r, P_{At}/P_{It})] = Q_{At}^*(K_{It-1}, S_{It}, P_A, r, P_{At}/P_{It}) \end{aligned} \quad (14)$$

假定初始的外生冲击分别来自工业部门内部储蓄增加和利率提高,则对我们关注的内生变量,由复合函数的链式求导法则并结合此前的假定可知,均衡的调整过程为:

$$\frac{\partial Q_{At}^*}{\partial S_{It}} = \frac{\partial Q_{At}^*}{\partial I_{It}} \frac{\partial I_{It}}{\partial Q_{IAt}^*} \frac{\partial Q_{IAt}^*}{\partial L_{It}} \frac{\partial L_{It}}{\partial K_{It}} \left(S_{At} \frac{\partial K_{It}}{\partial S_{It}} + S_{It} \frac{\partial K_{It}}{\partial S_{At}^*} \frac{\partial S_{At}^*}{\partial Q_{IAt}^*} \frac{\partial Q_{IAt}^*}{\partial S_{It}} \right) > 0 \quad (15)$$

$$\partial Q_{At}^* / \partial r = (\partial Q_{At}^* / \partial I_{It}) (\partial I_{It} / \partial r) > 0 \quad (16)$$

这两式分别展示了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业产出增长的两种机制:一是工业部门内部储蓄增加的初始冲击对工业部门总投资的增加产生直接与间接两种效应。间接效应的作用途径是,工业部门储蓄增加导致资本存量增加,从而对农业部门劳动力和农产品的需求增加,于是增加了农业部门通过部门间金融市场向工业部门输送储蓄的量,促进了工业部门投资的增加。据此,工业部门总投资的增加进一步促进了对农业部门劳动力和农产品的需求,从而增加了农业部门的产品交换收入及其从工业部门购买投资品的能力,最终通过增加农业资本品的投入来增加农业产出。二是利率水平的外生作用通过提高农业部门的收入水平,增强农业部门从工业部门购买资本品的能力,进而提高农业产出。

(2)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部门收入。假定经济中劳动力总量为 L_t ,工业部门的实物(以工业品价格来衡量)工资水平为 W_t ,工业部门的货币收入仅来自工资所得,则由式(4)及相关假定可知,农业和工业部门的人均货币收入分别为:

$$\text{averinc}_{At} = Y_A / (L_t - L_{It}) = (1 + \beta r) P_{At} Q_{IAt} / (L_t - L_{It}) \quad (17)$$

$$\text{averinc}_{It} = P_{It} W_t \quad (18)$$

显然,工农两个部门的人均收入之比取决于如下因素:工农贸易条件、利率水平、农业劳动力存量、工业部门工资水平和部门间农产品交换量。金融发展对部门间收入之比的影响机制有二:一是部门间金融市场利率的提高增加了农业部门的人均利息货币收入;二是随着农业部门储蓄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增多,工业部门资本积累增多,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因此,这有可能减少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存量,同时也会导致工业部门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并改变工农贸易条件。这两方面的效应都会产生提高农业部门相对收入之比的结果。

(3)农村金融发展与部门间劳动力转移。类似地,可以得到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劳动力跨部门转移的如下机制:随着农村储蓄通过部门间金融市场由农村向工业转移规模的扩大,工业部门的投资水平与资本存量增加,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根据工业部门新增劳动力来自农村的假设,这会导致更多的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从而提高劳动力的非农化比率。

4.假说。根据上述研究,可以得到关于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二元转型关系的如下假说:在一个除利率外不存在政府干预、不考虑市场摩擦且满足一般性假定的二元经济中,随着工农部门间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利率水平的提

高,通过部门间市场均衡的作用,农业产出、农业人均收入水平和劳动力的非农化比率都将得到提高,从而促进经济的二元转型。

这一假说表明,与以往通常的观点不同,从促进经济的二元转型视角来看,不能简单地将农村储蓄向工业的转移视作农村的“失血”。假如工农部门间存在一个良好的互动机制,那么农业部门储蓄向工业的转移是有利于促进经济二元转型的,而且这一转型过程并不必然造成城乡差距的扩大。除市场存在摩擦外,我们观察到非预期结果或许源自政府过度干预、观察期长度不同以及对农村金融发展功能的理解视角不同。

三、计量模型、变量、数据与估计方法

1. 计量模型设定。上述理论模型仅关注了经济二元分割、农村金融资源在相当长时期内起着向城市单向输送农业剩余的作用、城乡间存在产品互换等转轨时期的基本特征。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显然并非仅是一个市场机制日益完善环境下的内生转型增长过程,还是一个根植于计划经济体制初始环境中的政府外生推动的制度变迁过程。由此,可能影响工农部门间经济金融互动机制的制度等因素也应被纳入建模的视野。根据理论模型的逻辑架构,式(11)给出了变量间的一个不完全递归逻辑体系。据此,式(11)中的变量几乎均是内生的。不过,考虑到样本容量的有限性以及理论模型并不完全反映现实,这里仅将所关注的如下变量设为内生的:农村金融发展(afidep)、农业产出增长(aoutcome)、城乡相对收入(rincome)和非农劳动力占比(rlabor)。具体计量模型采用既考虑非理论导向又兼顾理论与现实约束的面板结构 VAR(PSVAR)模型,标准化后的形式为:

$$\begin{cases} aoutcome_{it} = \alpha_1 + \beta_{11} afidep_{it} + \beta_{12} rincome_{it} + \beta_{13} rlabor_{it} + Y_{i,t-1}^T A_1(L) + Z_{1it}^T \Gamma_1 + \alpha_{1i} + u_{1it} \\ rincome_{it} = \alpha_2 + \beta_{21} afidep_{it} + \beta_{22} aoutcome_{it} + \beta_{23} rlabor_{it} + Y_{i,t-1}^T A_2(L) + Z_{2it}^T \Gamma_2 + \alpha_{2i} + u_{2it} \\ rlabor_{it} = \alpha_3 + \beta_{31} afidep_{it} + \beta_{32} aoutcome_{it} + \beta_{33} rincome_{it} + Y_{i,t-1}^T A_3(L) + Z_{3it}^T \Gamma_3 + \alpha_{3i} + u_{3it} \\ afidep_{it} = \alpha_4 + \beta_{41} ralbor_{it} + \beta_{42} aoutcome_{it} + \beta_{43} rincome_{it} + Y_{i,t-1}^T A_4(L) + Z_{4it}^T \Gamma_4 + \alpha_{4i} + u_{4it} \end{cases} \quad (19)$$

其中, $Y_{i,t-1}^T = (aoutcome_{i,t-1}, rincome_{i,t-1}, rlabor_{i,t-1}, afidep_{i,t-1})$, $Z_{jit}^T (j=1, 2, 3, 4)$ 为由前定变量组成的向量, $A_j(L) (j=1, 2, 3, 4)$ 为滞后算子向量多项式, $\alpha_{ji} (j=1, 2, 3, 4)$ 为非观测因素。类似于 Sims (1972)、Christiano 等(1999)以及 Cecchetti 和 Rich(2001)的分析,假定结构设定后的 $u_{jit} (j=1, 2, 3, 4)$ 的一阶差分为零且协方差矩阵 $E(U^T U) = \Omega$, 其中 Ω 是对角线元素相同的对角阵。

2. 变量定义与测算。(1)内生变量。aoutcome:反映农业产出的指标主要有二:一是农林牧渔总产值,二是一产增加值或农业 GDP。本文拟选择“农业 GDP”指标刻画农业产出,并选择最能反映 GDP 平减指数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调整(以 1978 年为基期)rincome:农村人均纯收入包括生产性纯收入与非生产性经营收入两项,我们采用温涛等(2005)、姚耀军(2005)所运用的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指标。城镇居民收入采用“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 $\text{rincome} = \text{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 \text{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 afidep :金融发展指标的选择取决于研究对象的特点与选择的指标是否能反映金融发展的功能。根据上文的逻辑,在本文中,金融发展指的是农村金融资源通过部门间金融市场向城市的转移。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一指标反映的是二元经济结构下储蓄动员能力与投资项目的跨部门优化选择。本文采用“(农户储蓄存款年末余额-农业贷款余额)/农户储蓄存款年末余额”来反映城乡资金互动。 rlabor :统计年鉴中与此有关的统计指标有二:一是“按城乡分就业人员数”;二是“按三次产业分就业人员数”。基于两个指标的内涵与本文研究设定,这里选定第二个指标中的“一产就业人员占比”来刻画 rlabor 。不过,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是开放的,某一省份的一产劳动力占比变化并不一定完全源自其自身内部的工农互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利用战明华(2010)所采用的产业增加值劳动吸收能力调整系数法,对各省实际非农产业从业人数进行调整。

(2) 外生变量。从中国转轨时期的经济环境出发,这里主要控制两个因素:一是经济产权性质的变迁;二是各省间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变化。经济产权性质(propr):根据理论部分经济环境的假定并结合中国的现实,这里选择工业内部经济体的产权结构变化来刻画制度变迁。由于集体经济是中国转轨过程中的一个新生力量,其变化并非反映原有经济制度的瓦解,因此,最终采用的指标是“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市场一体化程度(marinteg):我们关注的是城乡一体化程度,因而反映全国的指标更合适。出于数据完整性考虑,我们选用董晓宇和郝灵艳(2010)所测算的结果作为我国整体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度量,以期控制与理论模型假设相异的各省非封闭的经济事实。此外,其他外生变量除实际利率 R 外,由于在经过 1993—1997 年农村三大金融体系构建以及 1998—2000 年国有金融机构从县域以下全面收缩的改革后,农村与城市间的金融资源流动渠道发生了重大变化,因而为控制这种结构变化的影响,在系统中还引入时期虚拟变量 D :2000 年以前取值为 0,2000 年以后取值为 1。

3. 数据来源。本文数据为分省面板数据,样本区间为 1978—2009 年。由于样本的特殊性,北京、上海、天津、重庆以及海南被剔除,西藏因缺少大部分年份的农户储蓄存款与农业贷款数据也予以删除。利用三阶前向或后向趋势移动平均法,对广东 1988 年以前的相关数据、湖北 1978—1985 年以及湖南 1978—1987 年的农业贷款余额数据、青海 1986—1987 年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进行了调整或补充。数据主要来自《中宏数据库》,从业人员数与一产从业人员数 1989 年前数据、工业总产值和国有企业工业产值 1985 年前数据均来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2005—2009 年的农户储蓄存款数据来自《中国金融年鉴》。另外,缺失的工业总产值 2004 年数据以及个别地区、个别年份的其他变量缺失数据均用各省统计年鉴数据补充。

4.估计方法。与普通 VAR 模型相比,由于允许利用理论所提供的先验信息对内生变量间的关系施加约束,SVAR 模型考虑了随机扰动项之间的同期相关性,从而使基于随机扰动项冲击的脉冲分析更具有逻辑性(模型具体形式略)。

四、实证结果

1.总量结果。需要说明的是,一方面,初始的 VAR 回归结果表明利率系数符号大致正确但不显著;另一方面,利率是理论假定中的外生变量,而部门间金融市场发展代表农村金融发展,因而下面主要分析农村金融发展的效应。图 1 和表 1 至表 3 分别给出了 1978—2009 年关注变量的脉冲响应轨迹与方差分解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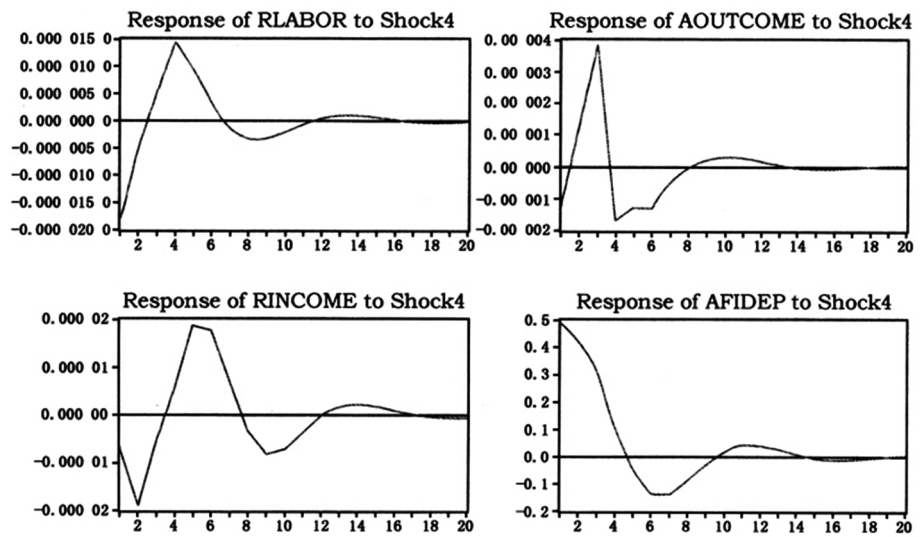


图 1 各变量对 afidep 一个标准差冲击的脉冲响应:1978—2009 年

表 1 rlabor 的方差分解结果:

表 2 aoutcome 的方差分解结果:

1978—2009 年					
时期	标准差	Shock1	Shock2	Shock3	Shock4
1	0.03	100.00	0.00	0.00	0.00
2	0.04	99.83	0.00	0.04	0.13
3	0.04	99.09	0.36	0.41	0.15
4	0.04	98.88	0.36	0.43	0.34
5	0.04	98.76	0.38	0.43	0.43
6	0.04	98.73	0.38	0.45	0.44
7	0.04	98.72	0.38	0.46	0.44
8	0.04	98.71	0.38	0.46	0.45

1978—2009 年					
时期	标准差	Shock1	Shock2	Shock3	Shock4
1	0.08	0.30	99.70	0.00	0.00
2	0.08	0.30	99.67	0.01	0.03
3	0.08	0.63	98.83	0.22	0.32
4	0.08	1.15	98.25	0.26	0.35
5	0.08	1.46	97.89	0.26	0.38
6	0.08	1.46	97.84	0.29	0.41
7	0.08	1.47	97.82	0.29	0.42
8	0.08	1.47	97.82	0.29	0.42

注:shock1 表示来自 rlabor 的波动贡献率,shock2 表示来自 aoutcome 的波动贡献率,shock3 表示来自 rincome 的波动贡献率,shock4 表示来自 afidep 的波动贡献率。下同。

由图 1 结果可知:第一,给定一单位 afidep 的正向冲击,无论 rlabor、aoutcome 还是 rincome,冲击响应函数的变化过程均表现出围绕 0 均值线呈波形变化特征,而并未出现在 0 均值线以下或以上收敛的情况,这部分证明了前

面的假说。这一结果表明，从长期动态转型增长视角看，或许传统上我们对金融资源由农村向城市转移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有些担忧过度。实际上，如果尝试从动态代际交迭理论对此加以解释的话，在有效控制了其他非市场因素的情况下，农业部门在初期向

表 3 rincome 的方差分解结果：
1978—2009 年

时期	标准差	Shock1	Shock2	Shock3	Shock4
1	0.03	1.03	24.31	74.66	0.00
2	0.03	1.34	23.41	74.81	0.44
3	0.03	1.70	23.41	74.44	0.46
4	0.03	1.65	23.09	74.79	0.47
5	0.03	1.63	22.86	74.66	0.85
6	0.03	1.63	22.78	74.39	1.21
7	0.03	1.64	22.74	74.36	1.26
8	0.03	1.64	22.71	74.37	1.27

工业部门转移的资金等同于未来从工业部门获得补偿的“贴现”，因而从长期看，假定代际间的福利函数是相同的，那么经济仍是动态有效的。这一结果提示我们，如果将历史的镜头拉得更加长远，那么面对发展中经济两部门分割的现实，问题的关键可能并不在于资金的跨部门流向，从中央计划者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根据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所体现出的城乡互动特征，适时调整经济均衡增长路径，以实现经济的长期整体动态最优。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或许我们应当将“三农”问题的解决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二元动态转型视野中，而在这一框架中，农村金融发展的功能也将被重新审视。

第二，无论 rlabor、aoutcome 还是 rincome，在当期均出现了下降，但下降的幅度与持续时期不同，而最后均大致正向收敛至 0 则再次支持了假说。图 1 显示，在初期，反映城乡劳动力转移的一产就业人员占比 ralbor 指标降幅最大，rincome 降幅最小。这表明，金融资源由农业向工业的转移对促进劳动力的跨部门转移进而减少农业劳动力的效果是显著且迅速的；而农村与城市居民收入之比虽然也出现下降，幅度却相对最小；相对而言，金融资源的跨部门转移对农业产出增长只具有中等的负向初始影响。从影响的时间跨度看，城乡居民收入比（乡村比城市）持续下降约 3 个时期，这与温涛等（2005）的结果基本一致；农业劳动力占比持续下降 2 个时期；农业产出在当期的下降与基于短期效应的已有研究一致（赵旭等，2005），但在第 2 期冲击效应即转为正。总的来看，各个指标在短期内均出现了下降，这与理论预期及人们对农村资金外流的传统担忧相一致，但从长期看，所有变量均以比较显著的正向效应最后趋近于 0，这进一步对前面的假说提供了支持，并再次印证了区分短期分析与长期分析的重要性。

第三，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所产生的冲击对各个二元转型指标的波动贡献较小且非均衡。表 1 至表 3 显示，虽然随着时期的延长，农村金融发展对非农就业人数、农业产出与城乡收入比波动的贡献有所增大，但在观察期内均未超过 1.5%。这表明，虽然来自农村金融的冲击对二元转型在某些时期有着显著的正负效应，但这种效应的绝对水平并不大。这既进一步支持了对农村资金外流或许存在过度担忧的判断，又说明了二元转型是一个复杂过程。总体来看，来自农村的积累对二元转型至少在改革开放后很可能已不占主导。方差分析结果还表明，相对于其他变量，城乡收入比的波动受其他因素尤其是农业产

出的影响较大,表明即使在一个二元转型框架内,农业自身发展对解决城乡收入差距仍具有重大影响。

2.分时段比较。总量 SVAR 估计结果表明,反映结构性变化的虚拟变量 D 的系数在几乎所有方程中都显著不为 0,这提示我们或许 2000 年是样本数据生成过程的一个分水岭。虽然加入虚拟变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这种结构变化,但虚拟变量通常只能假定这种变化线性地影响截距或斜率,因而具有局限性。为了更充分地利用信息及对两个阶段进行更深入的对比,下面进一步对 SVAR 系统进行分时段估计,脉冲响应结果见图 2、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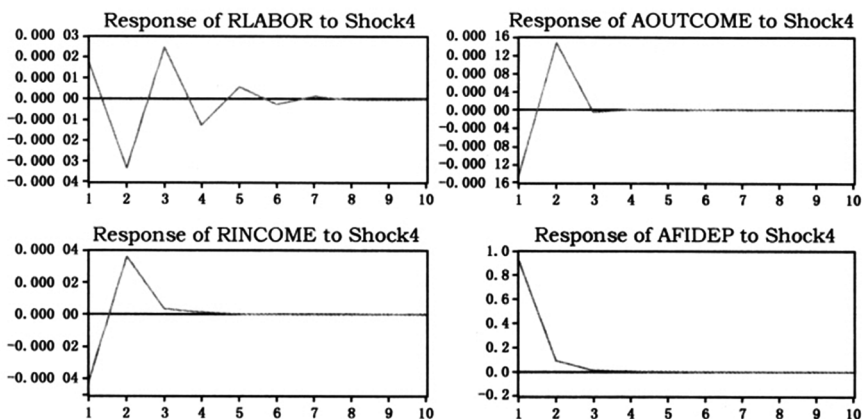


图 2 各变量对 afidep 一个标准差冲击的脉冲响应:1978—200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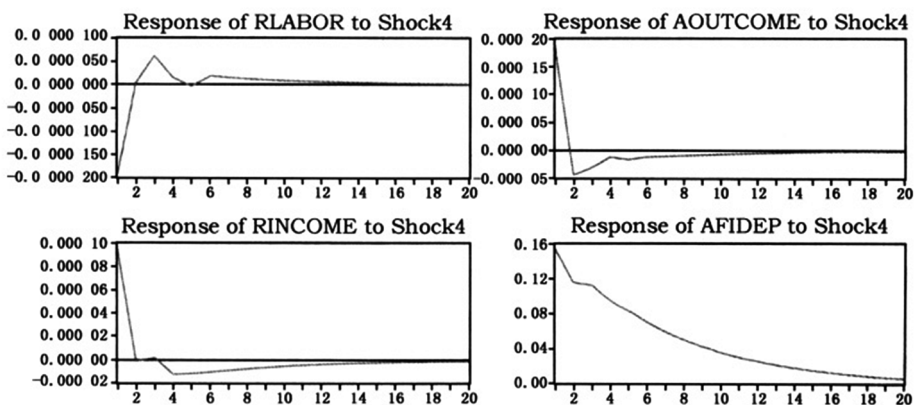


图 3 各变量对 afidep 一个标准差冲击的脉冲响应:2000—2009 年

图 2、图 3 显示,1978—2000 年和 2000—2009 年的脉冲响应轨迹有着较大的差别,表明农村金融发展与二元转型的关系存在时间段上的“区间效应”:总的来看,1978—2000 年各变量的脉冲响应轨迹与总量情况大致相似,即各变量对来自农村金融市场发展冲击的反应均在初始阶段存在波动,最终则大

致以正向效应的趋势收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2000—2009年,面对来自农村金融发展的一个单位正向冲击,除第1期外,冲击对其他变量的影响效应迅速变为负并最后收敛至0。

脉冲响应轨迹所表现出的“区间效应”为我们从二元转型的视角来观察农村金融发展提供了启示:一是虽然农村资金外流现象一直受到诟病,但或许我们应当对改革开放中前期农村资金外流的价值重新进行评价,农村资金外流在转型期的特殊阶段可能有助于促进二元转型,进而通过二元转型的城乡互动机制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而这进一步印证了我们的结论与假说。二是城乡互动机制似乎并未随着转轨的推进而不断改进。尽管改革开放中前期存在着要素流动非市场化、国有经济占主导等种种体制障碍,但部门间金融市场发展与二元转型的实证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中前期可能存在着更有利于提高长期经济效率的城乡互动机制。这种现象或许与当时坚持制度创新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轨迹有关,而这反过来又促使我们反思:在转轨后期,我们是否忽视了不断的制度创新仍应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动力?在未来的转轨过程中,我们是否应重新重视制度创新的作用?三是城乡资金流动政策应当随转轨过程所内生规定的城乡经济互动机制的变化而变化。“区间效应”表明,如果在改革开放中前期的农村资金外流从长期看将使所有部门均受益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后期,农村资金外流的长期效应主要是拉大了城乡差距,阻碍了二元转型推进。因而,此时应适时调整政策,建立一个能吸引工业部门资金来反哺农业的农村金融体系,这也是近些年来农村金融改革的目标。

总之,尽管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城乡部门间的金融交易理论上有助于推进二元转型,但是现实情况却并未尽如人意。这一结果的产生可能源自两个方面:一是时至今日,从机构进入仍受严格控制的角度看,农村金融市场仍处于被抑制的状态;二是由于城乡贸易条件并未出现逐渐向有利于农村的动态转化,农村金融作用于二元转型的机制被扭曲。显然,这一分析蕴含着重要的政策含义:如果我们试图更好地发挥农村金融对经济二元转型的促进作用,那么实行更有利于高效农村金融组织演进的政策,以及通过更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重塑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城乡要素与产品相对价格体系,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政策选项。

五、结论与启示

第一,在假定经济中只存在工业与农业两个部门且农业部门内部同质的条件下,通过构建一个部门间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的一般均衡模型,本文首先规范分析了以部门间金融市场发展为代表的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产出、农业部门收入和部门间劳动力转移等三个反映二元转型进程变量的作用机制,并提出了一个假说——在一个自然演进的二元经济环境下,工农部门间金融市场的发展并未构成对二元转型的阻碍的判断,而二元转型进程又与农业部门

的发展紧密相关。机制分析过程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二元转型的正向促进效应是通过市场均衡力量作用下城乡良好的经济互动机制来实现的。对比已有的国内研究可以发现,部门间金融市场发展对二元转型与农村经济具有正向效应的判断向传统的观点提出了挑战。然而,如果将本文的理论假定条件与现实相对比,我们会发现,或许正是纷繁复杂的经济现实中诸多非市场化等外在干扰以及所观察的时间长度不同,模糊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直观判断。

第二,总量脉冲响应结果表明,虽然在短期内以部门间金融市场为代表的农村金融发展的冲击会给二元转型带来负面效应,但从长期看,响应的轨迹基本支持本文的假说。总量脉冲轨迹显示,在初期,随着储蓄资金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增加,除农业劳动力占比外,农业产出和城乡居民相对收入所受冲击的效应均为负,这与传统的观点一致。但如果拉长观察的视野,那么冲击将显示出波动性并最终以比较显著的正向效应趋近于0。这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本文的假说,也说明了区分长期与短期的重要性。不过,总量方差分析结果也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二元转型各变量波动的解释力并不大。这既表明我们可能对农村资金外流的负面效果存在过度担忧,从长期看,农村资金向城市的转移可看作一种资源的跨期最优配置,也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来自农村的积累很可能已不是二元转型的主要资金来源。

第三,分时段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二元转型的关系存在“区间效应”,这部分支持了本文的假说,也为理解转轨时期城乡互动的机制与效应以及检讨政策实施效果提供了新的视角。1978—2000年和2000—2009年的分时段脉冲轨迹显示,二者存在明显的差别。前者大致与总量结果一致并基本印证了假说,后者则与假说有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区间效应”给出了如下提示:一是或许我们应当对改革开放前期的农村资金外流所做“牺牲”的价值做重新评价,农村资金外流在转型期的特殊阶段可能有助于促进二元转型;二是城乡互动机制并未改进,改革开放中前期的城乡互动机制似乎更为良好。对比改革不同阶段的制度阻碍,迫使我们反思,在改革的后期我们是否忽视了制度创新仍是转轨最重要动力?这也提示我们,通过城乡互动机制的进一步制度创新,或许是未来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值得重新重视的路径选择。

第四,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基于农村金融市场内部同质性的假定使本文的研究实际只关注了工农部门间金融资源的互动,但我们认为,这一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为观察中国农村金融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并为这种观察的逻辑构建了一个规范的分析框架。本文的分析表明,如果从二元转型增长的视角来观察农村金融发展,那么许多问题将获得与通常直觉不符的结论,而已有的判断或许需要重新审视。

主要参考文献:

- [1]陈文俊.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相关性实证研究[J].系统工程,2011,(3):40—46.
[2]董晓宇,郝灵艳.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定量研究:改革开放30年市场化指数测度[J].当代经济管理,2010,(6):8—13.
[3]刘民权.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杨帆,马艳红.农村经济增长中正规金融支持的效果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9,(7):54—58.
[5]战明华.经济二元、结构效应与转轨时期的货币长期非中性[J].金融研究,2011,(5):72—85.
[6]张国强.农村资金外流与农村经济发展:体制困境与求解路径[J].农业经济,2006,(5):8—9.
[7]Cecchetti S, Rich R. Structural estimates of the U.S. sacrifice ratio[J].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2001, 19(4): 416—427.
[8]Walsh C E. Monetary theory and policy[M]. MA: The MIT Press, 2010.

Rural Form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Du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Promotion or Inhibition?

XU Yue-li^{1,2}, ZHANG Zhong-gen¹

(1.Center for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9,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past studies taking information economics as the main theoretical basis, this paper reexamines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rural form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from a new perspective of du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Fei-Ranis model of dual transformation growth, it constructs 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of urban and rural economic interaction based on financial markets of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sectors. Then it makes a normativ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finance and du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proposes a hypothesis. This paper employs a SVA model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and the long-term interaction among variables to verify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bovementioned.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the control of other factors,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markets between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sectors based on the mechanism of natural market evolution is contributive to dual transformation growth.

Key words: du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terval effect
(责任编辑 许 柏)